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3期
2020年5月，頁1-44
10.30383/TJH.202005_(53).0001

邵雍遷居洛陽前期關係網絡初探：以尹洙為線索

紀晏如 *

北宋神宗年間，邵雍(1011-1077)在洛陽時期與眾多名士大夫往來的故事是史上有名的佳話。據筆者初步研究，邵雍在皇祐元年(1049)舉家遷洛的行為，其實是被作為古文運動和儒學(尤其集中於穆修、尹洙和李之才這一系)的同道被引薦到洛陽，進入了洛陽當地的學術網絡，並憑藉著自身的學識在洛陽士大夫圈子中嶄露頭角。也因此當司馬光(1019-1086)、文彥博(1006-1097)等名士大夫在熙寧變法期間退居此地時，才會和當時已經身為洛陽名士的邵雍相識，並進一步結為好友。

邵雍在洛陽初期往來的友人大抵擁有近似的學術傾向，他們多半出自於歷代為官或業儒，愛好古文且久居洛陽的士人家族。本文希望以尹洙為線索，藉由考察邵雍遷居洛陽的此一過程，一窺當時士人之間的學術網絡是如何組建，志趣相投的士人彼此又可能是如何結交。

關鍵詞：邵雍、關係網絡、洛陽、尹洙、宋代、儒學、古文運動、墓誌銘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聯絡電郵：yanru.ji@gmail.com

一、問題意識

以往針對邵雍(1011-1077)交游的研究，多集中在熙寧變法，舊黨退居洛陽後的時期，尤其著重在邵雍與司馬光(1019-1086)、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呂公著(1018-1089)、文彥博(1006-1097)等人的往來上。但邵雍並非出身官宦世家，自己也沒有功名，在他年近四十，舉家遷居洛陽時，還只是一介籍籍無名的白衣士人，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士大夫或士君子。但在變法期間退居洛陽的程顥筆下，邵雍「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1]自邵雍於皇祐元年(1049)遷洛，至熙寧初年司馬光、呂公著等人因反對王安石(1021-1086)變法，退隱洛陽，與邵雍結成好友，約有二十年時間之久。[2]邵雍何以能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得以迅速融入他們的交游圈？

以往一般多以為是邵雍的學養深厚，經年累月積累，聲名自然遠傳。[3]因此研究主題也多集中在邵雍的師承，以及熙寧變法期間在洛陽與諸多賢士大夫的交游上，而少及於邵雍遷洛前後這段時間的狀況。然而在熙寧變法之前，邵雍是如何在當地傳開聲名，以致於當司馬光、文彥博等這群名重一時的士大夫退居此地時，能以一介白衣的身份迅速地與他們結交？邵雍在洛陽初期究竟是和一群什麼樣的人來往？他們之間是否又有什麼樣的一種關係、是什麼樣的一種群體？此乃本文意欲探詢的主題。

據筆者初步研究，邵雍在皇祐元年(1049)舉家遷洛的行為，其實是被作為古文運動和儒學(尤其集中於穆修、尹洙和李之才這一系)的同道被引薦到洛陽。平田茂樹在分析宋代的朋黨政治時，曾將宋代士人的社會關係分為血

---

1 程顥，《二程集(上)》(臺北：里仁書局，1982)，卷5，〈邵堯夫先生墓誌銘〉，頁503。

2 「熙寧三年(1070)，司馬溫公與王荊公議新法不合，……遂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子康節游」。參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9，頁210；「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恆相從遊，為市園宅」。參見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427，〈邵雍傳〉，頁12727。

3 如唐明邦，《邵雍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34。

緣、學緣、業緣和地緣四個分類，在李之才過世後，邵雍失去良師，又在科考中幾度名落孫山，在這個徬徨的時候，他之所以會毅然舉家遷至洛陽，正是由於受到這個學術網絡的「學緣」所牽引。[4]而在這個學緣網絡的加持之下，又進入了洛陽人文薈萃的「地緣」網絡。

誠如許多學者指出，宋代的古文運動其實屬於儒學復興運動的一環，它首先提出「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的理想，開啟並奠定了宋代儒學的基調。[5]古文運動提倡以義理為宗、經世致用，並要求重新閱讀、認識經典，理解聖人記載於經典中的微言大義，而非拘泥於章句訓詁。在邵雍到洛陽所接觸的這一批人中，就包括了眾多這樣的人士，除此之外，他們還多半出自久居洛陽、世代為官或業儒的家族。[6]由於目前所遺留的史料中，關於穆修、李之才的資訊相當不足，相較之下，身為古文運動健將，交遊廣闊，又有文集留存的尹洙則留下了較多資訊可供探詢。故筆者發現，若以尹洙為線索，其實能夠將邵雍初至洛陽所結交的這批友人連結起來。也會發現他們原本就屬於同一個關係網絡，彼此在學術交流、婚姻關係上都有所聯繫。

以血緣、婚姻關係形成的士人家族，是具有文化特徵的社會組織，也是宋代學術傳承的一個重要載體。[7]這一批人在學術史上雖沒有特別突出的地位，但他們一方面承載並延續了前一波思潮，一方面也成為一條無形的引線，將如邵雍這樣有近似學術傾向的人物引入這個學術網絡之中。也因此本文除了希望對於邵雍舉家搬遷到洛陽一事提出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思考之外，也希望能藉由邵雍這一條線索，探索在連結北宋古文運動以及理學興起之間的一股伏流，試圖描繪在這兩座高峰之間以往被人忽視的地貌。

---

4 平田茂樹在此所稱之「業緣」乃指「同官、同僚等職業上的關連」，與佛教所謂「業緣」不同。參見平田茂樹，〈宋代朋黨形成之契機〉，《宋代政治結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38。

5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45。

6 洛陽在宋代稱西京，是北宋陪都，當時提到河南府(河南)或洛陽郡(洛陽)時，往往是指同一塊區域。參見張祥雲，《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頁28。

7 黃寬重，〈洛學遺緒——高氏家族的學術與政治抉擇〉，《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2006)，頁175-200。

目前關於邵雍的人際關係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熙寧三年(1070)後與大批退隱洛陽的舊黨人士之間的往來，如邵明華的《邵雍交游研究》，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該書的研究重心均集中在一般家喻戶曉的名字，如司馬光、富弼(1004-1083)、二程和張載(1020-1077)等人身上，試圖還原他們的交往始末、細節等。[8]鄭定國在《邵雍及其詩學研究》則具體羅列了在《邵雍集》中明確可考，與邵雍有所來往的學侶或好友，並整理了他們的生平以及與邵雍交往的相關史料。[9]森博行也同樣是以邵雍與他最親近也最著名的友人司馬光作為研究主題，並整理出他們從相識到邵雍過世為止的交游歷程。[10]在周君芸的《邵雍弟子考》中，參考了《宋史》及《宋元學案》，羅列了邵雍大多數弟子生平，但仍偏向於整理的工作。[11]只有在〈邵雍遷洛之前求學與漫游的再研究〉中初步考察了邵雍在遷居洛陽前曾漫遊四方，並與王豫、祖無擇(1011-1084)及邵必結識的時間線，但也僅是偏就他們個人和邵雍之間的往來，並未深入研究他們之間的關係。[12]

此外，在目前的研究中，大多傾向於將邵雍在洛陽的發跡歸因於富弼，由於在至和二年(1055)，富弼曾推舉邵雍出任官職，基於富弼在當時的地位，加上此乃邵雍生平首次得人舉薦，故多半認為他是最早發掘邵雍的貴人。[13]也因此在《宋元學案補遺》中，邵雍雖自有〈百源學案〉，但仍被列

---

8 邵明華，《邵雍交游研究——關於北宋士人交游的個案研究 》(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頁14-23；何新所，〈試論西京洛陽的交游方式與交游空間——以邵雍為中心〉，《河南社會科學》，第4期(鄭州，2011.04)，頁64-67。以及邵明華，〈話題與傳播：邵雍交游圈的深度考察〉，《西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蘭州，2012.05)，頁100-107；中尾健一郎，《古都洛陽と唐宋文人》(東京：汲古書院，2012)，第9、10章。

9 鄭定國，《邵雍及其詩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頁32-44。

10 森博行，〈司馬光・邵雍交游録(前)(中)(下の上)(下の下)〉，《大谷女子大国文》(大阪，2003-2006)，頁33-36。

11 周君芸，《邵雍弟子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12 郭鵬，〈邵雍遷洛之前求學與漫遊的再研究〉，《中國文化研究》，(北京，2009.04)，頁68。

13 如鄭定國，《邵雍及其詩學研究》，頁148；邵明華，《邵雍交游研究》；張明華，〈富弼與邵雍關系之研究〉，《洛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洛陽，2012.03)，頁42-47。

入〈高平學案〉中的「文忠(富弼謚文忠)門人」項下。[14]但經檢視史料發現，富弼與邵雍之間並非單純只是在茫茫人海中慧眼識珠這樣的故事，富弼之所以和邵雍產生交集，有很大的可能是來自於牽引邵雍至洛的這個關係網絡。基於目前針對邵雍交游研究的性質，筆者認為，就本文所提出的問題意識而言，仍有許多可供探詢的空間。以下章節將根據此一問題意識，針對邵雍在熙寧變法以前，在洛陽以尹洙為線索展開的交游網絡進行考察，並展開進一步分析。

二、邵雍入洛前之學術網絡

(一)李之才及其交游圈考察

在邵雍早年往來的對象中，以他和業師李之才(980-1045)之間的授受最為知名。而李之才所帶給邵雍的不僅是學術，還將邵雍帶進了自己的交游圈中，與這個圈子的聯繫，也是邵雍之後選擇遷居洛陽的關鍵因素。以下將先對李之才的交游圈作一簡單介紹，再接著分析它和邵雍日後遷洛陽的關係。

李之才師承宋初古文大家穆修(979-1032)，與尹源(996-1045)、尹洙(1001-1047)兄弟同學。[15]穆修在宋初雖然最以古文出名，但也是有名的經學家。[16]他的學生之中，尹源、尹洙兄弟自早年起便以儒學聞名，[17]尹洙本人深於《春秋》，[18]尹源在寫作時也特別強調「經術之教」與文章的關係，[19]李

---

14 王梓材、馮雲濠編撰，〈高平學案補遺〉，《宋元學案補遺(一)》(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414。

15 脫脫，《宋史》，卷295，〈尹洙傳〉，頁9831；《宋史》，卷431，〈李之才傳〉，頁12823。

16 金中樞，〈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再續(上)〉，《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11期(臺南，1984)，頁3-5。

17 脫脫，《宋史》，卷295，〈尹洙傳〉，頁9838。

18 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范文正公全集》(成都：四川大學，2002)，卷5，頁183。

19 馮志宏，《北宋古文運動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255。

之才則是以易學著稱。[20]他們在經學研究上，都反對漢唐以來泥於章句的傾向，主張直究經文本旨，由經義而入義理，這是宋代經學當代化的一種表現，可謂開理學之先。[21]可以看到，邵雍在拜李之才為師時，「(李之才)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22]邵伯溫也說：「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為本，蓋得聖人之深意。」[23]邵雍以《易》名世，其先天學、術數之學往往被後人視為不傳之祕，然而邵雍早年在李之才門下，用力最深、並引以為本的卻是經學一途，尤其是可表儀五經大旨的《春秋》。當時認為，《春秋》和《易》這兩本書講明人事，為先王治世之大法，是宋初士人在重新回向經典、尋求通經致用可能性的情況之下，[24]普遍最重視的兩部經典。《春秋》重視名分大義的說法，更是呼應了當時穩固中央、大一統政府的首要政治需求。[25]

尹氏兄弟和李之才不僅曾同學於穆修，還是天聖八年(1030)的同榜進士，[26]彼此相交甚契。尹洙曾向人舉薦李之才，稱他：「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27]不僅推崇他在為政方面的才能，更以身為古文運動領袖的身份盛讚李之才在古文方面的成就。在慶曆五年(1045)李之才過世後，尹源竟然因為「哭李之才過哀」而感染風疾，不到一個月也跟著

---

20 脫脫，《宋史》，卷431，〈李之才傳〉，頁12824。

21 金中樞，〈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再續(上)〉，頁7-8。

22 脫脫，《宋史》，卷431，〈李之才傳〉，頁12824。

23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9，頁215。

24 關於宋代士人回到經典，重新尋求治道之論述，可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頁3-7。

25 錢穆，〈初期宋學〉，《中國學術思想史(五)》(臺北：東大出版社，1983)，頁1-13；錢穆，《國史大綱》(下)，第41章，頁884-896。

26 傅璇琮，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一)》(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147、154，尹洙在天聖二年已中進士，天聖八年再應書判拔粹科中舉。宋代進士同年的關係甚為堅固，被視為是一種融朋友、兄弟為一體的新社會關係。參見祈琛雲，〈宋人的同年關係及其對同年關係的認同〉，《西南大學學報》，第1期(重慶，2012.01)，頁95-105。

27 脫脫，《宋史》，卷431，〈李之才傳〉，頁12824。

身亡。[28]歐陽修(1007-1072)在與尹洙談論尹源後事時也感慨地說：「蓋他(尹源)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29]由這幾件事，均可看出李之才和尹氏兄弟之間相知之深，交情之厚，並不僅僅是簡單地同門或同年之誼。

邵雍是在李之才擔任共城令時和他相識，如以李之才在天聖八年(1030)考中科舉，再加上根據《邵氏聞見錄》記載：

> 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歲成一非。」[30]

「憶昔初書大字時」詩作於熙寧七年(1074)，邵雍時年六十四。[31]若由詩中上推四十五年，邵雍年約十九、二十歲，可推算約是天聖九、十年(1031-1032)左右，約莫就是邵雍與李之才相遇，並開始受教於他的時間。

在邵雍行狀中稱，邵雍學於李之才「三年而學以大成」。[32]但邵雍和李之才並非一直待在共城，李之才在共城令任期滿後，由共城調往河南孟州，為河陽司戶曹，邵雍也跟著他來到孟州州學苦讀。[33]現在雖不知李之才赴孟州任的確切時間為何，但可以由史料推測，李之才其實在孟州待了一段不短的時間。首先是在宋史本傳中記載：「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34]李之才調任孟州時，長官為范雍(981-1046)，且直到范雍離開，李之才都還在原職。據考察，范雍的前任馮元是在景祐二年(1035)二月離職，范雍又在景祐四年(1037)離職，[35]由李之才來到孟州時范雍已在，又在范雍離職時送他推論，李之才應該是在景祐二年到四年之間來到孟州，一直到康定元年(1040)

---

28 脫脫，《宋史》，卷431，〈李之才傳〉，頁12824。(宋史作「尹洙兄漸守懷」，但應為尹源，字子漸。參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卷31，〈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銘〉，頁219。

29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17，〈與尹師魯第五書〉，頁493。

30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8，頁215。

31 邵雍，《邵雍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12，頁366。

32 張嵋，〈行狀略〉，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第12冊，卷5，頁986。

33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8，頁194。

34 脫脫，《宋史》，卷431，〈李之才傳〉，頁12824。

35 李之亮，《北宋京師及東西路大郡郡守考》(成都：巴蜀書舍，2001)，頁131-132。

四月，石延年(994-1041)調兵河東，辟李之才為澤州簽署判官後，才離開孟州。[36]

值得注意的是，邵雍除了隨著李之才來到孟州，並入州學讀書之外，李之才很可能也將他引薦給了當時也正在孟州任職的好友尹源。由李之才在孟州時，曾為衛廷諤之妻徐氏作了一篇墓誌推論，徐氏在景祐五年(1035)過世，葬於寶元二年(1039)，墓誌亦作於該年，是衛廷諤之子衛觀商請好友李之才所作。[37]而根據《孟縣志》記載，衛廷諤的墓誌也同樣作於寶元二年(1039)，在他的墓碑上，陽刻為〈衛府君墓誌〉，陰刻則是他的妻子徐氏的〈高平縣君墓誌〉，〈高平縣君墓誌〉為李之才所作，[38]〈衛府君墓誌〉的作者則正是尹源。[39]

根據歐陽修為尹源所作墓誌，稱：「(尹源)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40]可知尹源在及第後的經歷，由衛廷諤夫婦的這兩則墓誌來看，在寶元二年(1039)時，李之才和尹源應該同時在孟州，兩人也應該都和衛家人熟識。因此，若邵雍這段期間跟隨老師待在孟州的話，李之才肯定會將自己的得意門生介紹給好友認識。如照後來晁說之(1059-1129)記載：

> 邵伯溫曰：「李挺之，康節先生之師也。昔嘗聞之先公曰：『挺之與尹子漸貌相類，又相友善，挺之死於子漸官舍，子漸哭之慟，遂得疾以卒。』嗚呼！二人者，天者乃所謂朋友歟！」[41]

邵雍既然曾對兒子表示過李之才與尹源外貌相似，必曾親見尹源，否則難以有此定論。如此一來，李之才既然在生前便將邵雍介紹給了尹源，也為邵雍日後前往洛陽，與尹洙、尹源的門人後輩結交埋下了契機。

---

36 脫脫，《宋史》，卷431，〈李之才傳〉，頁12824。

37 「(衛)觀才而且孝，之才其友也。」李之才，〈宋故左千牛衛將軍衛君夫人高平縣君墓誌銘〉，收入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第26冊，卷554，頁185。

38 阮藩濟等修、宋立梧等纂，《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公司，1986)，頁1106。

39 阮藩濟等修、宋立梧等纂，《孟縣志》，頁597。

40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31，〈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頁219。

41 晁說之，《嵩山文集》(上海：上海書店，1984)，卷19，頁181。

(二)邵雍前往洛陽前與此關係網的淵源

邵雍在皇祐元年(1049)前往洛陽前曾收了侯紹曾和王豫兩名弟子，這兩人和尹洙也都有甚深淵源。時任武陟縣令的侯紹曾是邵雍遷洛的主要助力，王豫則被邵伯溫認定是少數得到邵雍真傳的弟子之一，[42]史料中對於王豫與邵雍的記載雖然相當稀少，侯紹曾和邵雍的往來更只在《邵氏聞見錄》中留下短短數行文字。但如考察他們生平及親屬網絡，就會發現他們和尹洙的關係其實甚為密切，在學術上也都有著近似的趨向。此外，邵雍早年曾至四方遊歷，他在京師開封所結識的好友祖無擇不只和他師出同門，同屬於穆修門下，也和洛陽有著相當深厚的地緣關係。

1. 侯紹曾

邵雍的門生侯紹曾是幫助他遷洛的關鍵人物，此事不僅明文記載在邵雍之子邵伯溫所著的《邵氏聞見錄》中，亦記於《宋元學案》中的「百源門人」下，據載：

> 皇祐元年，自衛州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遷居焉。門生懷州武陟知縣侯紹曾字孝傑助其行。[43]
>
> 侯紹曾，字孝傑，懷州人。康節過洛陽，愛其風俗之美，將遷居焉，先生方知武陟縣，……遂助其行。皇祐初，康節始奉其父伊川丈人赴之，於是諫議呂公誨、王公益柔以下，二十餘家共為買宅，而先生實倡之。[44]

這兩則史料都明確指出了侯紹曾在推動邵雍遷洛這個決定中的作用，而據《宋元學案》記載，侯紹曾不僅是邵雍遷洛的主因，在遷洛之後，有二十餘家當地士人共同為邵雍出錢購置新居，也是出自於侯紹曾的提議。而當時

---

42 邵伯溫，《易學辨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第9冊，卷1，頁7。

43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8，頁215。

44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二)》(北京：中華書局，1982)，〈王張諸儒學案〉，頁1163。此條雖由全祖望增補，僅見於《宋元學案》，但由邵伯溫的記載，以及侯紹曾一家在洛陽與邵雍交游圈的密切關係看來，全祖望此條記載，應非無據。

身為武陟縣令，人並不在洛陽的侯紹曾為何能在邵雍遷洛的這件事中起如此大的作用，又為何能夠說動這二十餘家士人？據筆者推測，應該是來自於他和洛陽的深厚淵源。

若考慮到侯紹曾的出身背景，就會發現，侯氏一家其實是久居洛陽的官宦世家，侯紹曾的曾祖侯益(886-965)自五代起家，入宋之後甚為顯赫，其子侯仁寶(?-981)還是宋代開國功臣趙普(922-992)的妹婿，侯益在告老致仕後選擇在洛陽終老，侯家子孫此後雖然不再居於高位，但依舊世代為官，並居住於此。[45]根據尹洙為侯紹曾之父侯詠(?-1039)所作墓誌，侯益雖為武將，然而侯紹曾的祖父侯仁浦便已讀書為進士，父親侯詠更是喜好儒術，氣節為人所尚。侯詠將女兒嫁給了王曾(977-1038)之子王繹，[46]王曾除了是仁宗時名相以外，也喜好儒學，除了他本人與孫復(992-1057)為友之外，[47]其所作〈有物混成賦〉也頗為程顥所稱，認為這是他「所養所學，發為言詞者，可以觀矣」。[48]從這一點看來，侯、王兩家的婚姻，除了是北宋習見的、兩個高級文官家族之間的聯姻以外，侯詠和王曾兩人對儒學的共同愛好，很可能也在這起婚事中起了相當的作用。

相較於父親，侯紹曾在推動儒學方面有著更為具體的記載，根據龔鼎臣(1010-1086)所記：

> 夫五經，道之源也。……鄴郡陳子堅(陳安石)、河南侯孝傑(侯紹曾)，俱以儒名，相與擇士之秀者，……各取一經以治之，由是一室之中，講誦正醇仁義之言，馥如椒蘭，天人之理，邃如江海。[49]

從文中可知，侯紹曾和父親一樣喜愛儒術，並以此知名。不僅如此，他還開班授徒，講授經學，希望能夠探求五經中的「道之源」及「天人之理」，

---

45 脫脫，《宋史》，卷254，〈侯益傳〉，頁8879-8882。

46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5，〈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河南府澠池縣事侯君墓誌銘并序〉，頁67。

47 石介，《徂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1090冊，卷19，〈泰山書院記〉，頁91。

48 程顥，《二程集(上)》，卷12，頁673。

49 龔鼎臣，〈羣居治五經序〉，收入《全宋文》第43冊，卷931，頁154。龔鼎臣同時也是邵雍好友張景山的岳父，參見劉摯，〈正議大夫致仕龔公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77冊，卷1680，頁147。

正是當時普遍希望從經典中尋求義理的儒學思潮。[50]

侯紹曾和尹洙的往來要追溯到錢惟演(977-1034)知河南府時，當時錢惟演幕下匯聚了許多賢才名士，號為天下之盛，其中包括了歐陽修、尹洙、富弼和梅堯臣(1002-1060)等人，周遭還有眾多仰慕他們的國子學學生，如深為歐陽修賞識、日後也成為邵雍好友的王尚恭(1007-1084)、王尚喆兄弟。[51]儘管姓名未曾被記載在冊，但久居洛陽，又屬世家子弟的侯紹曾也是恭逢這場盛事的其中一員。除了在侯詠墓誌中可以看到尹洙自述，他之所以為侯詠作墓誌，是出於友人侯紹曾的請託之外。[52]更明顯的例子是在嘉祐四年(1059)梅堯臣贈與侯紹曾的詩中，梅堯臣回憶他和侯紹曾過去交往的情形：「同在洛陽時，交游盡豪傑。倏忽三十年，浮沈漸磨滅。……君本公王孫，才行實修潔。鏘鏘發英聲，瑩瑩如佩玦。」[53]從嘉祐四年(1059)倒推三十年，大約是天聖八年(1030)，也正好是梅堯臣供職於錢惟演幕下的時候。[54]侯紹曾既然和梅堯臣在天聖末年的洛陽相交，所處環境又是「交游盡豪傑」，那麼應該可以推論侯紹曾就是在這場文化盛會期間與梅堯臣、尹洙等人結識，並成為好友。

在尹洙、梅堯臣的眼中，侯紹曾不僅熱心儒學、品學兼優，更是出身

---

50 金中樞，〈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再續(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11期(臺南，1984.12)，頁21-23。

51 以錢惟演為核心、謝絳為實際盟主的洛陽文人集團，今可考知姓名者共約二十二人，主要包括錢惟演、謝絳、張汝士、尹洙、楊愈(字子聰)、梅堯臣、張太素、王復、歐陽修、尹源、富弼、張先、孫次公(孫長卿)、孫祖德、張谷、王顧、錢暄、楊辟、張亢、張至、王尚恭、王尚喆。另外，圍繞這一洛陽文人集團的周圍還有一群西京國子學的生徒們，人數達百餘人。參見王水照，〈北宋洛陽文人集團的構成〉，收入《王水照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頁138、149。

52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5，〈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河南府澠池縣事侯君墓誌銘并序〉，「紹曾與予善，狀君閥閱，俾誌於壙，且為之銘。」頁425-426。《宋史侯益傳》中雖然只列了侯益的五個兒子：侯仁願、侯仁矩、侯仁寶、侯仁遇、侯仁興，但考慮到侯仁浦早卒，可能因此未被列入傳中，且尹洙記載侯紹曾的曾祖事蹟與宋史相同，應該是同一人無誤。

53 梅堯臣，〈送侯孝傑殿丞簽判潞州〉，《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1102。

54 梁建國在《朝堂之外：北宋東京士人交游》一書中提及，由於河陽、洛陽僅隔黃河南北相望，梅堯臣時常往來兩地，和洛陽的謝絳、歐陽修等人往來。參見梁建國，《朝堂之外：北宋東京士人交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頁73。

「公侯家」、「公王孫」的貴胄子弟，可以想見，儘管在侯益過世後，侯家便沒有再出過特別突出的人物，然而侯家居於洛陽已有數世，又曾是本朝顯貴，必然有著包含親緣、地緣等各式關係，可說是根基深厚。在這樣的背景底下，就比較能夠理解，為何侯紹曾會向邵雍提出移居洛陽的建議，又何以能夠向「諫議呂公誨、王公益柔以下，二十餘家」提議，[55]由這一群洛陽本地名士共同為剛搬到洛陽的邵雍出錢購置新居。也因此在以下針對邵雍洛陽諸友的介紹中，也將不時看到侯紹曾的名字再次出現。

2. 王豫

王豫是邵雍在遷洛之前所收的弟子，他和尹洙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他的父親王沿(?-1044)。王沿和尹洙是天聖二年(1024)的同榜進士，有同年之誼。[56]在王沿過世之後，王豫向尹洙請求為父親作行狀，並表示：「先君知子，子不可無述。」[57]這篇行狀中，尹洙並未循例為王沿的一生作傳，而是特別側重描寫了過去和王沿的一樁舊事：

> 慶曆四年，……先生與予語《春秋》，因出《唐志》二十篇，且曰：「此未嘗以示人。」先生於褒貶善惡之著者，若無所指，意其甚異者，衆之所尚或詘之，衆之所謝或嘉之。予亦疑其然，先生為予問其端，質於大中之道，考之於《春秋》，無相戾者。[58]

王沿以進士起家，少治《春秋》，因為不滿於當時章句注疏之學，因此蒐羅刪述，著為《春秋集傳》一書，同時又以《春秋》筆法作《唐志》，以褒貶善惡，為官時亦以《春秋》斷事。[59]學者稱之為是宋學由謹守傳注，轉而箋及己見的經學當代化代表人物之一。[60]尹洙在當時以《春秋》學見稱於世，

---

55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二)》，〈王張諸儒學案〉，頁1163。

56 傅璇琮，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一)》，頁124。尹洙首次考上科舉是在此年，天聖八年又應拔萃科中試，故亦與李之才、尹源同榜。

57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成都：四川大學，2004)，卷13，〈王先生述〉，頁411。

58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3，〈王先生述〉，頁411。

59 脫脫，《宋史》，卷300，〈王沿傳〉，頁9957。

60 金中樞，〈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再續(下)〉，頁21-22。

號稱「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61]又能夠欣賞王沿作《唐志》之意，王豫應該就是知道這點，才會在父親過世後前來請求尹洙為其作傳，作為一生的蓋棺定論。由於目前並無其他相關史料證明王沿和尹洙有更多的往來，故推測尹洙和王沿生前可能並沒有密切聯繫，但由尹洙所記載的這件往事看來，他們兩人應當可以算得上是交淺言深，在摒棄傳注、直指經義的這方面也是志同道合的學友。王豫雖然不以《春秋》見稱，但其所擅長的仍是以義理為重的《易》學，[62]他便是因為與邵雍論《易》時被折服，才執弟子禮拜邵雍為師。[63]

3. 祖無擇

慶曆年間，年輕的邵雍曾離家四處遊歷，並在開封結識了祖無擇，兩人結為好友。[64]祖無擇的籍貫記載雖為上蔡，但自從其曾祖祖仲宣通判河南府、並葬於此之後，祖家歷代都葬在此地，可說是出身洛陽的本地人士。[65]祖無擇的曾祖和祖、父都是進士，曾祖祖仲宣還是宋初名相李昉(925-996)的女婿，是自宋初以來的文官世家。祖無擇年少曾從孫復學經術，從穆修學古文，並在他們兩人死後，為他們求取文稿，編輯成冊。[66]歐陽修也曾與他詳細申論古文寫作應「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67]祖無擇自己的文道觀也主張「積於中者謂道，發於外者謂文。有道有文，然後可以為君子。」[68]在古文運動風氣初開時，其文名甚至有「開風

---

61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28，〈尹師魯墓誌銘〉，頁199。

62 張嵋，〈行狀略〉，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冊，卷5，頁986。

63 邵伯溫，《易學辨惑》，頁9-406。

64 郭鵬，〈邵雍遷洛之前求學與漫遊的再研究〉，頁68。

65 劉連香，〈北宋邵雍書篆祖士衡墓誌考〉，《四川文物》，第1期(成都，2008.01)，頁74。

66 扈曉霞、鄭衛、趙振華，〈北宋官員文士祖無擇生平仕履疏證(上)：以《祖無擇墓誌》和妻《黃氏墓誌》為中心〉，《洛陽考古》，第4期(洛陽，2016.04)，頁86。

67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18，〈與祖擇之書〉，頁498。

68 祖無擇，《龍學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1098冊，卷8，〈河南穆公集序〉，頁4。

氣之先，足與尹洙匹敵」的說法。[69]如由穆修這一脈來看，祖無擇甚至還可以說與邵雍係出同門。

儘管祖無擇為官以來均輾轉各地，少在洛陽，[70]但由兩人往返唱和的詩文看來，他們並沒有斷了聯繫。[71]在熙寧二年(1069)，祖無擇便曾試圖舉薦邵雍為官，[72]熙寧四年(1071)，祖無擇因與王安石交惡，回到洛陽，兩人重聚，邵雍還有詩感慨：「三十年交舊，相逢各白頭。海堧曾共飲，洛社又同遊」。[73]此後祖無擇在洛陽擔任閒職約近十年，中間還受文彥博邀請參與真率會，為「九老」之一，[74]以本地耆宿的身份落葉歸根。

三、邵雍入洛前期交游

(一)以尹洙為線索展開的關係網絡

邵雍曾有自述，他之所以嚮往洛陽，除了「愛其山水風俗之美」以外，[75]更重要的是洛陽本為古都，底蘊豐厚，是當時的文化中心，可以提供他「觀四方之士」的條件。[76]但這個希望要如何實現？誠如過去的研究所言，相較於中國傳統社會中具有濃厚鄉土性，由血緣、鄉里為基礎組成的交游圈，在大城市中，來自不同地域、背景的宋代士人，則是透過形形色

---

69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153，頁000-3a。

70 扈曉霞、鄭衛、趙振華，〈北宋官員文士祖無擇生平仕履疏證(上)——以《祖無擇墓誌》和妻《黃氏墓誌》為中心〉，頁86-87。

71 邵雍，《邵雍集》，卷5，〈寄陝守祖擇之舍人〉，頁242；〈歸洛寄鄭州祖擇之龍圖〉，頁245；〈和祖龍圖見寄〉，頁245；卷9，〈代書寄祖龍圖〉，頁313；卷10，〈代書戲祖龍圖〉，頁328。

72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8，頁197。

73 邵雍，《邵雍集》，卷9，〈代書寄祖龍圖〉，頁313。

74 扈曉霞、鄭衛、趙振華，〈北宋官員文士祖無擇生平仕履疏證(上)——以《祖無擇墓誌》和妻《黃氏墓誌》為中心〉，頁86-87。

75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8，頁194。

76 張嵋，〈行狀略〉，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冊，卷5，頁986。

色的交游活動，建立不同層次的社會關係，是一種人為營造所建構出的網絡。[77]相較於在科舉中取得功名者，自然有來自於同年、同事和官場上的各種人際網絡聯繫，邵雍在洛陽所接觸到的「四方之士」，主要是以他和李之才、尹洙一脈的師門網絡做為起點，因此在以下的章節中，將會著重分析邵雍遷至洛陽之後，他與李之才、尹洙兄弟這一系的關係，而這些關係又如何影響到他在洛陽的交游與人際網絡。

據邵伯溫記載，邵雍初至洛陽時最常往來的主要是以下這一些人物：

> 劉諫議元瑜字君玉、呂諫議獻可、靜居張少卿師錫及其子職方君景伯、狀元師德之子諫議君景憲、王諫議益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慎言不疑、慎行無悔、慎術子重、劉大夫師旦子絢、張諤字師柔及其子孫、南國(明抄本作「園」)張大丞師雄及諸子、劉龍圖之子秘監幾字伯壽、修撰忱字明復、侍講李寔字景真、吳少卿執中、王學士起字仲儒、李侍講育字仲象、子籲字端伯、姚郎中奭字周輔，交游最密，或稱門生。……後王不疑同鄉人買田於河南延秋村。……嘉祐七年，王宣徽(王拱辰)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還居之，富韓公(富弼)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78]

以上所列諸人，分別為劉元瑜、呂誨、張師錫、張景伯、張景憲、王益柔、王慎言、王慎行、王慎術、劉絢、張諤、張師雄(及其諸子)、劉幾、劉忱、李寔、吳執中、王起、王仲儒、[79]李育、[80]李籲、姚奭、富弼和王拱辰。儘

---

77 梁建國，《朝堂之外：北宋東京士人交游》，頁5

78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8，頁195。原文為「初寓天宮寺三學院。劉諫議元瑜字君玉、呂諫議獻可、靜居張少卿師錫及其子職方君景伯、狀元師德之子諫議君景憲、王諫議益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諤字師柔及其子孫、南國張大丞師雄及諸子、劉龍圖之子秘監幾字伯壽、修撰忱字明復、侍講李寔字景真、吳少卿執中、王學士起字仲儒、李侍講育字仲象、子籲字端伯、姚郎中奭字周輔，交遊最密，或稱門生。」中華書局此條下注：「『子中散兄弟』明鈔本『弟』字下有『慎言不疑、慎行無悔、慎術子重、劉大夫師旦子絢、張』二十字，可補此本之缺。」，頁205。故「諫議益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應為「王益柔、王慎行、王慎言、王慎術」，「諤字師柔及其子孫」應為「張諤(字師柔)及其子孫」較為完整。

79 雖然邵伯溫記為「王學士起字仲儒」，但檢閱相關史料，似有誤，應為王起及其子王仲儒，根據張耒〈王仲儒墓誌銘〉記載：「考諱起，尚書屯田員外郎，秘閣校理，

管這群人幾乎並沒有被列入〈百源學案〉，但其中如張氏一家，還有王益柔和劉幾家族，卻是與邵雍遷洛關係最深、也是與尹洙關係最為緊密的人際關係網絡，不只如此，他們還在邵雍遷洛初期為他購置房舍田產，提供了邵雍一家立足洛陽最基本的經濟支柱。[81]富弼和王拱辰更分別在致和、嘉祐年間舉薦邵雍，此外，還有自稱與邵雍「同里巷居三十年餘」的程頤。[82]經檢閱相關史料，邵雍在從皇祐元年(1049)遷洛以來，到嘉祐八年(1063)為止所接觸過、能查閱到姓名者有四十人(詳見附表一)，其中六人與他只有過一次如贈詩、互訪等往來記錄、未見深交，還有十五人目前在史料中找不到和此一關係網相關的證據，而有十九人則可以被列入這個關係網絡之中，比例約有一半，應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

在這些人之中和尹洙關係最為密切的，首先就是以他的得意門生兼乘龍快婿的張景憲(?-1080)為首的洛陽張氏一家。張師錫、張景伯、張景憲和張師雄(及其諸子)等人均出身自以張去華(938-1006)為首的洛陽張家。張去華仕宦歷經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官至轉運使，[83]其膝下共有十子，其中除張師德(?-1026)是大中祥符四年(1011)狀元，還娶了前宰相李沆(947-1004)之女為妻以外，[84]張師古、張師錫、張師顏等人也均在朝為官。[85]張家的再下一代，如張景伯、張景山、張景憲等張去華孫輩也俱有

贈左中大夫。……君諱仲儒，時中其字，世河南人」。參見張耒，《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60，〈王仲儒墓誌銘〉，頁890。文彥博亦有詩作「嘉祐中，余尹河南，與少師李公明，龍圖董巨源，集賢王伯初，同遊龍門。」注曰：「李東之、董沔、王起，熙寧中北京作。」可見王伯初即為王起，王仲儒為其子，字時中。參見文彥博，《潞公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第1100冊，卷7，頁631。

80 雖然邵伯溫記為「李侍講育字仲象」，但檢閱相關史料，李籲之父應為「李侍講育字仲蒙」。參見蘇軾，《蘇軾全集校注》(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卷64，〈李仲蒙哀詞一首〉，頁7075。

81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8，頁195。

82 程頤，《二程集(上)》，卷12，頁444。

83 脫脫，《宋史》，卷306，〈張去華傳〉，頁10110。

84 脫脫，《宋史》，卷306，〈張去華傳〉，頁10110；「(尹洙之女嫁張景憲)事父母，莊敬守禮，歸於太中，張氏西都名族。姑李夫人，宰相文靖公之女，治家尤謹法度。夫人奉事，常得其歡心」。參見范祖禹，〈長樂郡君尹氏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98冊，卷2150，頁327。

85 脫脫，《宋史》，卷306，〈張去華傳〉，頁10110。

功名。[86]儘管在邵雍遷洛時張去華已經去世，然而在他的子孫輩中，有許多人都和邵雍交好。

張家和尹洙的淵源首先來自於尹洙的得意門生張景憲，在張景憲的行狀中可以看到「師魯負天下重名，愛公之才，兩以女配之」，[87]尹洙在當時，以「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冠絕一世，[88]張景憲不僅身為尹洙愛徒，更先後娶尹洙兩女，集學緣和血緣的交集於一身，可見尹洙對其愛重之深。尹源之子尹植(?-1044)原是「見者皆曰：尹氏世有人」，[89]被視為是在年輕一輩中可繼承父輩之名、秀異特出的人物，不幸卻在慶曆四年(1044)早逝，在處理後事時，尹家便是將為尹植作墓誌的工作交給了張景憲，由此也可見得他與尹家之間的親厚。

既然和尹家有如此深厚的關係，那麼邵雍在剛到洛陽時便與和張景憲一家結識，進而成為好友，可以說是順理成章。也因此在邵雍遷洛初期，可以看到不少他和張家人密切往來的詩作，如與張景伯相關的「依韻和張元伯職方歲除」(嘉祐元年)、「謝西臺張元伯雪中送詩」、「哭張元伯職方」(嘉祐八年)三首作品。以及與張師錫唱和的「和張二少卿文白菊」(嘉祐二年)、「和張二少卿文再到洛陽」(嘉祐二年)兩首等等。[90]

除了張景憲之外，王益柔(1015-1086)，字勝之，和劉幾(1008-1088)、王尚恭(1007-1084)等人都可說是尹洙的莫逆之交，在邵伯溫的記載中，「王諫議益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慎言不疑、慎行無悔、慎術子重」，也就是王

---

86 參見范純仁，《范忠宣公文集》(成都：四川大學，2004)，卷17，〈太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張公行狀〉，頁501-502；劉攽，《彭城集》(合肥：黃山書舍，2008，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卷39，〈永安縣君張氏墓誌銘〉，頁323；范祖禹，收入《全宋文》第98冊，卷2149，〈大理寺丞張君墓誌銘(張淮)〉，頁312。

87 范純仁，《范忠宣公文集》，卷17，〈太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張公行狀〉，頁504。

88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23，〈論尹師魯墓誌〉，頁533。

89 張景憲，〈尹景仁墓誌銘〉，收入劉占卿主編，《宜陽縣志》(光緒辛巳〔1881〕，哈佛燕京圖書館影印)，卷16，頁671。

90 張師錫行二，曾任光祿少卿，歐陽修在嘉祐六年有「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予張師錫詩作，約同時期韓琦有「寄題西京致政張郎中靜居院」，宋庠亦有「致政張郎中」、「致政張少卿」等詩作，致贈對象均為張師錫。參見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362。若以時間及邵雍交遊狀況推論，這兩首詩應是邵雍與張師錫唱和所作。

益柔及其姪兒王慎言(1011-1087)、王慎行、王慎術等數人，富弼則是尹洙當年在錢惟演幕下的舊友。尹洙和王益柔的關係可以追溯到王益柔的父親王曙(?-1034)，明道元年(1032)，王曙繼任錢惟演為西京留守，當時歐陽修、尹洙等俱在麾下，王曙對尹洙相當欣賞，除了推薦他試任館閣校勘以外，[91]身後的神道碑也是由尹洙所作。[92]同時，就如王曙對尹洙的賞識，尹洙對王益柔這位後起之秀也甚為欣賞，王益柔在當時眾人眼中，可以說是一顆耀眼的明日之星，史稱「為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范仲淹(989-1052)曾推薦他出任館閣，[93]司馬光也說他是：「勝之家本公侯貴，弱冠英才已驚世」。[94]尹洙也說他：「俶儻宏達，服仁畏義，眞魁傑人」，[95]蔡襄(1012-1067)更稱讚王益柔是歐陽修一流人物。[96]

劉幾，字明復，和劉忱兩人為兄弟，是前河南府尹劉燁(?-1029)之子。[97]尹洙曾在劉燁下屬任職，在為劉燁所作的墓誌中，他除了自稱是「故吏尹某」，並稱許劉氏為衣冠世家之外，他也稱讚劉家素能教育子弟、保持家風，其子劉幾「聞效有材稱，……能世其家」。[98]和王益柔一樣，尹洙和這位老長官「聞效有材稱」的兒子甚為投契，在尹洙的文集中，也頗不乏他和劉幾討論學術、交換近況的書信往來。[99]

在前文中曾提到，侯紹曾和尹洙、梅堯臣結識的契機，是在天聖、明道年間錢惟演幕下的洛陽士人集會。當時這場盛會中人，除了一般所熟識的歐陽修、尹洙之外，據學者考證，其中就包括了最早舉薦邵雍的富弼以

---

91 韓琦，「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參見〈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收入《全宋文》第40冊，卷856，頁78。

92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2，〈故王文康公神道碑〉，頁403。

93 脫脫，《宋史》，卷286，〈王益柔傳〉，頁9634。

94 司馬光，《溫國文正公文集》，卷3，〈和勝之雪霽借馬入局偶書〉，頁30。

95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5，〈送王勝之贊善一首〉，頁367。

96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5，〈送王勝之贊善一首〉，頁367。

97 脫脫，《宋史》，卷262，〈劉燁傳〉，頁9074。

98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3，〈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公墓表〉，頁407。

99 參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8，〈與邠州通判劉九太博書〉，頁382；《河南先生文集》，卷4，〈志古堂記〉，頁361。

及王尚恭和弟弟王尚喆等數人，[100]在當時，富弼擔任河陽簽書判官，梅堯臣在集中提及他的詩就有八首，包括了〈憶洛中舊居，寄永叔兼簡師魯、彥國〉，中有「君同尹與富，高論曾莫攀，開吐仁義奧，傲睨天地間」等句，[101]記載當年與歐陽修、尹洙和富弼等人當年講談論道的舊事。除此之外，富弼的父親富言和尹洙的父親尹仲宣同是咸平三年(1000)進士，彼此還有世交之誼。[102]

在邵雍集中與其有多首詩作唱和，又一同從事賞花、飲酒、文會及共遊龍門等活動的王尚恭也是天聖年間與會的一員。王尚恭當時身為太學生，除了深得歐陽修賞識以外，[103]根據王尚恭父親王汲(?-1084)的墓誌銘和墓謁銘分別是由歐陽修和尹洙所作來看，王汲、王尚恭父子兩代都和他們交情甚深。如歐陽修在墓誌的一開始，就說他為王汲作墓誌是「與君遊，……與之遊者必愛其為人。」[104]尹洙也在王汲的墓謁銘中說「某與君遊最舊」。彼此相交甚歡的下一步便是結為婚姻，就像尹洙將女兒嫁給愛徒張景憲一樣，王汲將女兒嫁給了尹洙之子尹朴，[105]王尚恭又將女兒嫁給了尹洙之孫尹煥，[106]兩家世為婚姻。

由以上所列舉的這些人可以看出，他們都和尹洙有過直接來往，且關係頗為親近。而在邵伯溫列出的的二十多人中，李育父子、劉絢、吳執中雖然沒有和尹洙有過直接來往，卻和尹洙的洛陽網絡關係密切，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近似的學術傾向。既然和尹洙沒有直接關係，那這些看似單由

---

100 王水照，〈北宋洛陽文人集團的構成〉，頁131-149。這一批人包括了歐陽修、錢惟演、謝絳、尹洙、尹源、富弼、王復、楊愈、張先、孫長卿、梅堯臣等人。

101 王水照，〈北宋洛陽文人集團的構成〉，頁148-149；梅堯臣，《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憶洛中舊居，寄永叔兼簡師魯、彥國〉，頁55。

102 龔延明、祖慧，《宋代登科總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第1冊，頁203。

103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27，〈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頁191。邵雍與王尚恭的往來，參見邵明華，《邵雍交游研——關於北宋士人交游的個案研究》，頁122-132。

104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27，〈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頁191。

105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3，〈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雒縣事騎都尉王君墓碣銘〉，頁410。

106 范純仁，《范忠宣公文集》卷14，〈朝議大夫王公墓誌銘(王尚恭墓誌)〉，頁474。

一個個的名字看來，似乎並無關連的人物，他們又如何在這個網絡中聯繫在一起，彼此之間又是什麼關係？在以下的文章中，將針對這幾人進行介紹。

李籲(?-1087)和劉絢(1045-1087)最為人所知的身份，應是理學家程顥、程頤的大弟子，在李籲過世時，程頤曾有祭文，稱：「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仿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焉。」[107]可見他們在道學史上的份量。但在道學家的身份之前，劉、李兩家尚有其他值得進一步認識的特質。

在同為二程首徒的身份之外，劉、李兩家原就有婚姻關係，在李育為劉絢的祖父劉舜卿(?-1062)所作的墓誌中可以看到，劉絢的祖父劉舜卿以進士起家，父親劉師旦也是進士，一家都是洛陽本地人士，劉絢則是文官家族的第三代，以恩蔭入仕。李育自稱李家上世與劉家素有淵源，因此娶劉舜卿之女為妻，[108]也因此劉絢和李籲兩人是表兄弟，[109]彼此相識甚早，李籲對劉絢「結髮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的往事更是知之甚詳。[110]其父李育(1020-1069)，字仲蒙，為進士，根據邵雍好友張景伯之子張渭的墓誌看來，李育還是張渭的岳父。[111]儘管目前沒有關於李家先世的史料，不知是否在朝為官或業儒，但以李育在劉舜卿的墓誌中所言，由於劉、李兩家先人素有交情，因此娶了劉舜卿之女為妻這點來看，李育的父、祖輩即便沒有功名，很有可能也屬於士人階層，才能與劉家世代相交，又和洛陽當地著名的士大夫家族張家聯姻。

由於宋人行狀、墓誌的書寫者與傳主之間往往存在某種關聯或紐帶，例如同族、翁婿、連襟、師生、同學、同年、上下隸屬、同僚、政治或是相近的學術傾向，[112]因此在劉舜卿過世之後，劉家將劉舜卿的墓誌交給其

---

107 脫脫，《宋史》，卷428，〈李籲傳〉，頁12732。

108 李育，〈宋故朝奉郎守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護軍賜緋魚袋劉公墓誌銘〉，收入齊運通，《洛陽新獲七朝墓誌》(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383。

109 李籲，〈劉博士墓誌銘〉，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2冊，卷8，頁1023。

110 李籲，《朱子全書》第12冊，卷8，〈劉博士墓誌銘〉，頁1023。

111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卷30，〈承議郎致仕張君墓誌銘〉，頁813。

112 參見平田茂樹；林松濤、朱剛等譯，〈從劉摯《忠肅集》墓誌銘看元祐黨人之關係〉，

婿李育來作委實相當合理。而值得注意的是，劉家委託書寫這一方墓誌銘並為之題蓋的人，卻是二程的叔父程璠(?-1075)。[113]因此可以看出，李家、劉家和程家的關係，似乎並不止於二程收李籲、劉絢兩人為徒如此而已，而是早在此前，兩家之間早就互相有了許多交集。另一方面，劉舜卿的墓誌作於嘉祐八年(1063)，二程又是在結髮之齡就就收劉絢為徒，似乎暗示著程氏一家來到洛陽的時日頗為不晚。在《二程集》中還有一則值得注意的記載：

> 晁以道常說，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114]

晁以道(1059-1129)是司馬光的學生，但心儀邵雍，曾向程頤請教邵雍的術數之學。若照程頤的說法，其與邵雍曾同為鄰里約三十年，然而邵雍逝於熙寧十年(1077)，回推三十年，應是慶曆七年(1047)，若以邵雍至洛的皇祐元年(1049)計算，也可說是近三十年之數。

邵雍和程珦(1006-1090)、程顥、程頤父子之間的交誼素來為人所稱，他們在洛陽同里巷居、講論義理的故事至今仍傳為美談，邵雍更屬意在自己身後將墓誌銘交由程顥書寫，[115]對其可謂至為看重。然而邵雍和程氏一家是否真的在皇祐初年就有來往？目前並沒有史料可供佐證，唯一能找到相近的證據，是程頤在叔父程琥(?-1097)的墓誌銘中曾提到：「嘉祐初、公(程珦)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116]參考程頤年譜於嘉祐元年(1056)所記：「太中公(程珦)為國子博士，賜緋魚袋，先生兄弟隨至京師，在國子監讀書，……在京西染院。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117]由這條記載來看，

《宋代政治結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43-160。

113 李育，〈宋故朝奉郎守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護軍賜緋魚袋劉公墓誌銘〉，收入《洛陽新獲七朝墓誌》，頁383。

114 程頤，《二程集(上)》，卷12，頁444。

115 程顥，《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第4卷，〈邵堯夫先生墓誌銘〉，頁502。

116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第12卷，〈叔父朝奉墓誌銘〉，頁656。

117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16、19。

嘉祐元年(1056)程珦被派任到洛陽擔任國子博士，此時程顥尚未及第，與程頤兄弟兩人隨侍在側。若他們自嘉祐元年(1056)起便在洛陽定居，如此一來，邵雍確實有可能在嘉祐元年或更早就在洛陽與程氏父子相識，並相得甚歡。也因此在《邵雍集》中，才會有治平四年(1067)仲秋的〈思程氏父子兄弟因以寄之〉，[118]又在熙寧三年(1070)寄給程頤「料得預憂天下計，不忘君者更為誰」[119]這樣顯然相識已久、且又交情匪淺的詩句。如此一來，日後程顥雖在嘉祐四年(1059)考中進士，被派任官職，陸續前往各地，程珦也約在治平元年(1064)出任磁州，但程頤無職務在身，確實可能常在洛陽，程珦和程顥也有可能抽空回洛。自幼居於洛陽的劉絢之所以能在結髮之年便拜二程為師，也正是因為二程在洛陽早有居所，並且曾長時間居住的緣故。

程氏父子和此一關係網絡的聯繫，除了李育父子和劉絢之外，還需提到程家的另一位顯赫人物，也就是二程的族叔程琳(988-1056)，[120]他在真宗、仁宗朝曾先後執掌開封府、三司，一路升上同平章事之位，甚有作為。[121]雖然已經出了五服以外，程琳對於遠房族人如程珦等人仍相當照顧，如程珦自少年時起，程琳就對他相當器重，在程珦之父程遹過世時，家中生計無著，還是由程琳為程珦向朝廷請官。[122]程珦的兩名弟弟程瑜、程璠也都是因為得到這位族兄的蔭補資格而踏入仕途。[123]巧合的是，程琳是大中祥符四年的進士，恰巧和張景憲之父張師德還有劉絢的祖父劉舜卿為同年，[124]程琳更曾兩度舉薦張景憲這位同年之子，[125]對其頗為看重。

吳執中(?-1088)，字師聖，[126]他和邵雍之間的關係則可以追溯到尹洙的

---

118 邵雍，《邵雍集》，卷5，〈思程氏父子兄弟因以寄之〉，頁251。

119 邵雍，《邵雍集》，卷8，〈代書寄程正叔〉，頁288。

120 程琳和程珦同為程秀之六代孫，程秀長子程諲為程琳高祖，次子程俶為程珦高祖，程琳年長程珦二十一歲，為程珦族兄。參見王曾瑜，〈河南程氏家族研究〉，《錙銖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頁281。

121 脫脫，《宋史》，卷288，〈程琳傳〉，頁9673-9676。

122 程頤，《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12，〈先公太中家傳〉，頁646。

123 程顥，《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第4，〈程殿丞墓誌銘〉，頁495；〈程郎中墓誌〉，頁499。

124 傅璇琮，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一)》，頁96。

125 范純仁，《范忠宣公文集》，卷17，〈太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張公行狀〉，頁502。

126 邵雍之友吳執中和《宋史》卷356記載的吳執中同名但不同人，《宋史》的吳執中字

好友，也是邵雍先前所收的學生侯紹曾。由於吳執中之父吳祐之將女兒嫁給了侯詠(侯紹曾之父)，[127]因此在親屬關係上，吳執中是侯紹曾的舅父，在吳執中為母親杜氏所作的墓志銘中，也提到了杜氏的長女「嫁永清軍節度推官侯詠，其子為朝士。」[128]說明吳執中不僅知道侯紹曾、侯紹傑這兩名外甥的存在，也和他們有往來聯繫，知道外甥均在朝中任官。除此之外，吳執中和李育父子也同樣屬於張氏一家的姻親，有一名孫女嫁給了張景伯之孫張兢。[129]很可能就是因為和與尹洙關係深厚的侯家、張家兩家都有親屬關係，也身在這個關係網中，就因此成為了在洛陽與邵雍最早結識的好友之一。

從以上這些線索可以看出，像李育父子、劉絢和吳執中這樣的士人，雖然在邵伯溫列出的名單中乍看並沒有什麼關連，只是單純以個別士人的身份和邵雍往來，但其實這些人原本就屬於同一交游圈、甚至互為姻親。劉、李兩家和二程父子一家的關係也不僅是二程收李籲、劉絢為徒，他們兩家可能早就因為地理位置相近，而又品行、志趣相投而結為好友，往來密切，因此也才會順理成章地成為邵雍遷洛之後第一批關係最親近的友人。

(二)由古文、經學轉入義理的學術傾向

尹洙本人深於《春秋》，發明經義，摒棄注疏，又是當時使「天下之文一變而其古」的大功臣，[130]邵雍早年在李之才門下，用力最深、並引以為本的也同樣是以《六經》為本，尤其是義理可表儀五經大旨的《春秋》。[131]在邵雍所融入的這個交遊圈中，也深具此一學術傾向，如前文中介紹的侯

子權，建州松溪人，大觀年間過世，此處的吳執中字師聖，洛陽人。參見李寶宗、李晶晶，〈一則有關程顥、程頤、富弼、司馬光的北宋墓誌〉，《中原文物》，第4期(鄭州，2004.09)，頁98-100。

127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5，〈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河南府澠池縣事侯君墓誌銘並序〉，頁67。

128 吳執中，〈宋故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吳府君夫人京兆縣太君杜氏墓誌〉，收入《全宋文》第41冊，卷891，頁321。

129 李寶宗、李晶晶，〈一則有關程顥、程頤、富弼、司馬光的北宋墓誌〉，頁98-100。

130 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卷5，〈尹師魯《河南集》序〉，頁183。

131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9，頁215。

紹曾、祖無擇等均是如此。這樣一種儒學內部的變化，可說隱含宋代理學興起的先聲。

在這一群人之中，二程無疑是宋代理學的開山人物，對於天道、義理有大量論述，是宋學中期的核心人物，但如吳執中就只有留下短短一篇墓誌，以及他與程氏父子交好的記載，足可證明其學行，其餘則囿於史料所限，無法深論。在此之外，將就其他人目前史料所及的部分進行考察。

李籲和劉絢是二程的及門弟子，學問取徑自然毋須多言。在理學之外，劉絢更是「幼治《春秋》，其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132]後來劉絢更以《春秋》出名，被韓維(1017-1098)、王巖叟(1044-1094)和朱光庭(1037-1094)等人薦為太學博士。[133]李籲之父李育的名聲在後世雖為其子所掩蓋，但他長於《詩》和《史記》，[134]又曾參與議禮，晚年任職於岐王府上，「以經術輔導」，[135]在當時是一位以經學知名的人物。其所論《詩》義在南宋時猶為胡安國(字康候，1074-1138)、胡寅(字明仲，1098-1156)父子所稱道，胡寅在與人信中就曾引胡安國之言，說：「大人嘗言：『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李育)之說最善。』」。[136]胡安國學宗程頤，又精研《春秋》，他的這一番話，應該很可以代表理學家對於李育所論經義的態度。

和尹洙一樣，他的得意門生張景憲同樣長於《春秋》，「與朋友論辨古今，至忠義名節之際，必慨然歎息」。[137]和尹洙共同與於錢惟演幕下盛事的王尚恭，其家族乃是世代業儒的士人家族，根據歐陽修和尹洙為其父王汲所作的兩篇文字可以得知，王尚恭的曾祖和祖父雖沒有功名，但均通經術，[138]王汲則是「讀書惡異端，尤不喜陰陽拘忌之說，識者尚其道

---

132 李籲，《朱子全書》第12冊，卷8，〈劉博士墓誌銘〉，頁1023。
133 李籲，《朱子全書》第12冊，卷8，〈劉博士墓誌銘〉，頁1023。
134 蘇軾，《蘇軾全集校注》，卷64，〈李仲蒙哀詞一首〉，頁7075。
135 蘇軾，《蘇軾全集校注》，卷64，〈李仲蒙哀詞一首〉，頁7075。
136 胡寅，《斐然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18，〈致李叔易〉，頁386。
137 范純仁，《范忠宣公文集》，卷18，〈太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張公行狀〉，頁154。
138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27，〈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頁191；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3，〈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雒縣事騎都尉王君墓碣銘〉，頁410。

焉。」[139]歐陽修則稱，「(王)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140]由於史料不足的緣故，目前對於王尚恭及其家族的理解，只限於家中如歷代喜好儒學、通經術，父親不喜陰陽佛老之道等等，這些都普遍屬於宋初儒者的共通面貌。而由歐陽修、尹洙對王尚恭的推重，他對文道觀的理解，應當是接近於經世致用的古文，而非妍麗侈靡、怪奇艱澀之屬。

相較之下，儘管富弼在後世的評價中多半被視為一代名相，在學術上的面相往往被政績的光芒所掩蓋。但他在尹洙過世時所作哀詞中，卻清楚地流露出了他對於文道之際的重要觀點。在這篇祭文中，他說：

> 吾知君爲深，……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舛殊，大道破碎，漫漶費詞，……君於厥時，了不爲意，獨倡古道，以救其敝，時俊化之，識文之詣。……始君爲學，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爲，鈎抉六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匪彝。……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充用而衷，豐於時窮，純深蘊積，資而爲德，行乎已而已必裕，形乎家而家必克，……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罔不究，動必有經，列於庭則以蹇諤見黜，用於邊則以威懷取寧。[141]

字字句句，都是直指出尹洙欲以文章、學術求經中義理，進而求古道的用心。而在與〈陳都官書中〉，他自稱是「自始讀書為學，必窮其本原，不到聖賢用心處輒不止。」[142]更是明白說出要求「聖賢用心」這樣的話來，雖然仍未見精微，但這樣一種希望尋求新的義理教化之源，來作為立身處事根本的說法，皆是宋代經學轉向的表徵。

而與尹洙兩代相交的劉幾一家，自從其祖父劉溫叟起，便是古文的支持與愛好者，劉溫叟是宋初古文家范杲(939-994)的岳父，范杲又是古文名家柳開(948-1001)的好友，據宋史記載，他們彼此之間「更相引重，始終無

---

139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3，〈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雒縣事騎都尉王君墓碣銘〉，頁410。

140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27，〈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頁191。

141 富弼，〈哭尹舍人詞〉，收入《全宋文》第29冊，卷610，頁67-68。

142 富弼，〈與陳都官書〉，收入《全宋文》第29冊，卷610，頁22-23。

間」。[143]據載，范杲之所以得到劉溫叟的賞識，並招其為婿，就是因為范杲曾以自己的著作拜見劉溫叟，並得到了劉溫叟賞識的緣故。[144]劉溫叟在學術上的喜好也影響了他的兒孫，在尹洙為劉幾之父親劉燁所作的墓誌銘中就說，劉燁「少為古文章，篤於風義」，[145]自少年時起就愛好古文。尹洙在他的墓表中，更提到了劉燁和柳開弟子，同時也是古文名家的張景(970-1018)「定交論道，深相師友」的往事。[146]在為官後，劉燁「又建言黜章句篆刻之役，崇尚學術復聘士之禮，其章疏大較如此。」[147]這樣的形容出自對劉燁自稱為「故吏尹某」[148]的尹洙筆下，也很可以見得劉燁日常為官、為學的風格與取向。

更進一步可以看到尹洙稱許劉幾：「伯壽(劉幾)志於古聖人之道有年矣，日來年益加於道固益。」[149]以及尹洙在應劉幾之請所作的〈志古堂記〉中，講述他和劉幾關於立功、立言的討論：

> 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志古人之所志也。[150]

從尹洙和劉幾的這些文字中，可以更加明顯地看出劉幾為文，除了排拒浮靡之風以外，更希望藉由古文進而探求古道中的義理的態度。

在古文寫作和經學方面，講求義理、探詢「古道」的態度上，王益柔

---

143 《宋史》稱范杲「與柳開善，更相引重，始終無間」。參見《宋史》，卷249，〈范杲傳〉，頁8799；「大諫范公杲，方好古學，少有大名，特愛公文，常口誦於朝野間，為公之譽，世因稱為柳、范」。參見張景，〈食邑九百戶柳公行狀〉，收入《全宋文》第13冊，卷271，頁354。

144 脫脫，《宋史》，卷262，〈劉溫叟傳〉，頁9072。

145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3，〈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公墓表〉(以下簡稱〈劉公墓表〉)，頁407。

146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3，〈劉公墓表〉，頁407。

147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3，〈劉公墓表〉，頁407。

148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3，〈劉公墓表〉，頁407。

149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8，〈與邠州通判劉九太博書〉，頁382。

150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4，〈志古堂記〉，頁361。

的表現可以說尤為鮮明。自前代起，王家就是世代相傳的儒學世家，《宋史》特別記載，王益柔的父親王曙是初唐著名詩人王績(585-644)的後人，王績雖以詩名世，但他是大儒王通(584-617)的弟弟，王家更是南北朝以來的儒學門第。[151]

據載，王曙平日「退公私庭，諸子甥姪橫經侍席間。」[152]在擇婿時，也選擇了大儒孫奭(962-1033)之子孫瑜。[153]相較於父親對於儒學的愛好，王益柔在學術方面的傾向則更為顯著，在少年時，王益柔便曾被尹洙稱讚為文：「贍而不流，制而不窘，語淳而厲，氣壯而長。」[154]王益柔不喜朝廷以詩賦取士，就連范仲淹推薦他擔任館職，他也以不善詞賦為由推辭。[155]這點和尹源在被范仲淹、韓琦推薦，召試學士院時，自稱「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的態度可謂如出一轍。[156]論起「學緣」，他和尹源、蘇舜欽(1008-1049)等古文運動的中堅份子也是志同道合的學友，可以看到，在《蘇舜欽集》中有〈蘇子美(蘇舜欽)竹軒和王勝之(王益柔)〉、〈依韻和勝之暑飲〉等詩，[157]又在〈與歐陽公書〉中有「嘗與子漸(尹源)、勝之邸中小飲」等句。[158]除此之外，尹洙又稱王益柔在鑽研經義時，是「頗斥遠傳，解衆說，直究聖人指歸，大爲建明，使泥文據舊者，不能排其言。」[159]很清楚地表明了王益柔不僅在作文上反對駢驪，希望寫作明道致用的古文，在經學上也希望回歸原典、直指義理的態度。在前文中提到和侯紹曾志同道合，

---

151 錢穆，〈讀王通中說〉，《中國學術思想史全集(四)》，(臺北：聯經，1995)，頁7-8。

152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2，〈故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贈太保中書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銘並序〉(以下簡稱〈中書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銘並序〉)，頁406。

153 脫脫，《宋史》，卷330，〈孫瑜傳〉，頁10626。仁宗訪其家世，謂(孫瑜)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

154 脫脫，《宋史》，卷286，〈王益柔傳〉，頁9634。

155 脫脫，《宋史》，卷286，〈王益柔傳〉，頁9634。

156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31，〈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頁219。

157 蘇舜欽著，傅平驤、胡問濤編，《蘇舜欽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舍，1991)，頁150。

158 蘇舜欽著，傅平驤、胡問濤編，《蘇舜欽集編年校注》，頁612。

159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5，〈送王勝之贊善一首〉，頁367。

一起辦學傳經、「俱以儒名」的陳安石(字子堅)正是王益柔的妹夫。[160]陳氏一家也和尹洙相當熟悉，陳安石的父親陳貫、母親李氏和陳安石的妻子王氏的墓誌銘，都是由尹洙所作。[161]如尹洙在陳安石妻子的墓誌中所描述：「(陳)安石及夫人之兄(王)益柔皆與予游」，[162]這些種種，顯示出了王益柔等這一群致力於在文章、經學方面進行學術革新的士人都不是形單影隻地孤軍奮戰，而是彼此互通聲氣，日常更有許多的相互聯繫。

王益柔求學之心甚切，在求師訪友方面，還可以看到《朱子語類》中的這一段記載：

> 邵康節……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王益柔)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163]

邵雍在河南共城百源山中讀書是在遷居洛陽之前，而由朱熹的這段話看來，他在這時就已經和王益柔結為好友。朱熹和邵雍生活的時代雖相隔近百年，但是朱熹的父執輩多為理學中人，他自己也和呂祖謙這樣的世家子弟頻繁往來，呂祖謙的高祖呂希哲(1036-1114)，以及呂希哲之父呂公著都與邵雍關係甚為密切，因此朱熹的這一番話應該有相當的可信度。王益柔以相府公子之尊，頻繁造訪在當時仍寂寂無名的邵雍，應當是源於對邵雍學識的欽佩。

除了上文列舉的記載之外，王益柔自身留下的文字極少，不過可以發現，在他贈與邵雍的詩中有「先生精義已入神」一句頗值得玩味，[164]此句出自《易繫辭》，雖然此書在宋代士人之間相當普及，卻也是邵雍在他的著

---

160 尹洙，「女七人，適校……將作監主簿陳安石」。參見《河南先生文集》，卷12，〈中書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銘並序〉，頁406。

161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4，〈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陳公墓誌銘(陳貫)〉，頁416；《河南先生文集》，卷14，〈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陳貫之妻李氏)〉，頁416；《河南先生文集》，卷14，〈尹洙，故夫人王氏墓誌銘(陳安石妻、王曙女)〉，頁417。

162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4，〈尹洙，故夫人王氏墓誌銘〉，頁417。

163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7冊，卷100，頁3341。

164 王益柔，〈奉答堯夫先生金雀石硯詩〉，收入邵雍著，《邵雍集》，卷8，頁92。

作中特別發揮之處，如「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出入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藏諸用而顯諸仁。」[165]「『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不精義，則不能入神；不能入神，則不能致用。」[166]都是藉由《易繫辭》中「精義入神」的這一句出發，論「神」、論「體」，或「致用」，這些都是宋學發展到一個階段，開始進入精微之處的關鍵。這也或許可以從側面證明，王益柔和邵雍之間的論學，確實有在由經學、古文論義理，進而及於性理的範疇。這個轉變在范純仁(1027-1101)為王益柔之姪王慎言所作的墓誌中也可以略窺端倪，他稱王慎言「幼能詩，以風騷自任，……間繙閱古今，討究義理，……，晚達理性，間與道人游，放懷物外，往往忘返」。[167]在這一篇由范純仁為他做的墓誌銘中，提到了由「探究義理」到「晚達理性」的過程。范純仁為范仲淹之子，早年與眾多古文運動中人都有親身接觸，又和邵雍、程顥、程頤等人交好，范純仁的這一番文字，正好切中了他自長成到晚年這段時間學術轉變的要點。儘管王慎言和邵雍的往來，如今只留下詩歌交流的記載，[168]但精於義理，又早是王益柔訪學對象的邵雍，想見和王家叔姪的學術討論，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會少見。

(三)長居洛陽、互為婚姻的士大夫家族

在洛陽最早與邵雍為友的這批人，大半都是久居洛陽，世代為官或業儒的士大夫，最特別的是，他們除了有相同或近似的學術傾向之外，彼此家族之間還往往互為婚姻，在學緣、親緣的連結上都甚為緊密。

在這些人之中許多人居於洛陽已有數代，如劉幾、張景憲、劉絢和侯紹曾、祖無擇等人，他們的家族都在洛陽落地生根已久。劉幾家族歷代簪纓，又是當地大族，人稱：「自北齊至本朝五百餘年，而劉氏不衰。洛陽多大家，世以譜牒相付授，寧氏、劉氏尤為著姓，有可傳者。」[169]劉家自唐

---

165 邵雍，《邵雍集》，卷16，〈治亂吟〉，頁439。
166 邵雍，《邵雍集》，〈觀物外篇(下)〉，頁148。
167 范純仁，《范忠宣公文集》，卷14，〈中散大夫王公墓誌(王慎言墓誌)〉，頁479。
168 邵明華，《邵雍交游研究——關於北宋士人交游的個案研究》，頁139-141。
169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6，頁179-180。

代武德年間便在朝為官，劉幾、劉忱之父劉燁為進士出身，曾於天聖三年到五年(1025-1027)知河南府。[170]祖父劉溫叟(909-971)歷任後唐、後晉、後周，入宋後仍於朝中任職，在當地瓜迭綿延，是為大族。[171]張景憲家族與洛陽的關係始於其曾祖張誼，張誼自小愛好讀書，為求學有所成，放棄家中田產來到洛陽讀書，後來果然得中進士，祖父張去華則是宋太祖建隆二年(961)辛酉科狀元。張去華仕宦歷經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後以疾求分司西京，此後張家便在洛陽定居，可說是由宋初以來的官宦世家。在《邵雍集》中，從邵雍遷居洛陽，一直到他熙寧十年(1077)過世為止，都可以看到許多邵雍和張去華的子孫、曾孫輩相互往來的詩文記載。

張家的姻親李育一家上代原本居住在鄰近洛陽的緱氏縣，[172]但由李籲和劉絢表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173]又與三代為官、久居洛陽的劉家素有淵源的這點來看，[174]李家很可能在之後也搬到了洛陽。而與劉家、李家從父輩時起就彼此互有來往的二程一家，他們的家族可上溯至五代，二程的高祖父程羽(913-984)於後晉時擢進士第，入宋後官至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175]二程的曾祖，祖父和父親程珦雖然不如程羽官運亨通，但也均有官職，程顥自己也在嘉祐二年(1057)一舉中第，雖然程家是在嘉祐初年，程珦在洛陽為官時才定居洛陽，不過他們和久居當地的士人家族如劉、李兩家以及吳執中等人，都有相當良好的互動。

同樣是父輩在洛陽任官後便定居洛陽的還有王益柔、王尚恭和吳執中這幾人，雖然定居時間不算太長，但是如前文所述，他們也找到了學術志趣相投的士人圈子，並與之為友，在下面要介紹的則是他們在學緣之外，

---

170 脫脫，《宋史》，卷262，〈劉燁傳〉，頁9074；李之亮，《北宋京師及東西路大郡郡守考》，頁46。

171 脫脫，《宋史》，卷262，〈劉溫叟、劉燁傳〉，頁9072-9074。

172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卷30，〈承議郎致仕張君墓誌銘〉，頁812；蘇軾，《蘇軾全集校注》，卷64，〈李仲蒙哀詞一首〉，頁7075。

173 程頤，《二程集(上)》，收入《河南程氏文集》，卷11，〈祭李端伯文〉，頁643。

174 李育，〈宋故朝奉郎守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護軍賜緋魚袋劉公墓誌銘〉，收入《洛陽新獲七朝墓誌》，頁383。劉絢祖父和《宋史》中有傳的劉舜卿為不同人，宋史中的劉舜卿，其父在好水川之戰(1041)戰死時才十歲，不可能是劉絢祖父。

175 脫脫，《宋史》，卷262，〈劉溫叟傳〉，頁9072。

以婚姻關係締結的關係網絡。王益柔為前宰相王曙之子，王曙以進士起家，曾兩度任河南府尹，在參知政事卸任之後便治第西京，定居洛陽。王曙娶真宗朝名臣寇準(961-1023)之女為妻，王益柔正是寇準外孫，[176]是兩位宰相之家的後人。[177]王益柔的姪兒王慎言還是張景憲家族中，與邵雍交好的張師錫之婿，[178]張、王兩家不僅和尹洙各有淵源，彼此更是締結了婚姻關係的姻親。

由王尚恭之父王汲的墓誌可知，王家先祖曾任官於唐季、後蜀，入宋後，王尚恭的祖父、曾祖雖通經術，但並無功名，是直到王尚恭的伯父王湛方才舉進士起家，王汲則以兄長的恩蔭入仕，並在這一代舉家定居洛陽。[179]王尚恭早年雖在外地仕宦，但在嘉祐以後就因為母親年老，請求回到洛陽老家為官，一直到年老致仕為止都不曾再度遠宦，以他的交游圈而言，很有可能在熙寧以前就與邵雍相識。雖然王家定居洛陽的時間並不算太長，但王尚恭一家卻和洛陽的士大夫群體建立了相當緊密的聯繫。王尚恭除了有一名女兒嫁給尹洙之孫以外，還有一個妹妹嫁給了楚建中(1010-1090)，楚建中是出身洛陽的進士，[180]歐陽修在景祐元年(1034)在贈與他赴穎州任職的詩中就有「冠蓋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宴，遍識洛陽生」這樣的句子，西京相府指的是前任洛陽使相錢惟演的公府，而後兩句指的是歐陽修認識了洛陽舉子楚建中之事。[181]這樣看來，楚建中既是本地人，又與歐陽修在景祐之前相識，當年應該也是曾參與錢惟演幕下盛事的學子之一，並與王尚恭相識。此外，王尚恭也娶洛陽本地士人席汝言(1006-?)的妹妹為繼室，[182]這兩人都是日後和王慎言、劉幾等人一同被退居

---

176 脫脫，《宋史》，卷286，〈王曙傳〉，頁9631-9632。

177 脫脫，《宋史》，卷286，〈王益柔傳〉，頁9634。

178 范純仁，《范忠宣公文集》，卷14，〈中散大夫王公墓誌〉，頁479。

179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27，〈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頁191；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3，〈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雒縣事騎都尉王君墓碣銘〉，頁410。

180 脫脫，《宋史》，卷331，〈楚建中傳〉，頁10667。

181 歐陽修，《歐陽修集編年箋注》，〈送楚建中穎州法曹〉，頁406-407。

182 席汝言之父席夷甫、祖父席義、曾祖席誨，均為河南人。席汝言一家包括父親席夷甫、兄長席汝賢和席汝言自己都在朝中為官。參見席汝言，〈宋故朝議大夫王公夫人福昌縣君席氏墓誌銘〉(拓本)，劉馨珺於95年4月29日「宋代史料研讀會」解讀報

洛陽的文彥博邀請加入耆英會的成員。[183]可以看到，從王汲定居洛陽開始，到了王尚恭這一代，無論是在婚姻的選擇上，或者是在學術文化方面的投入(從錢惟演幕下的士人集會到熙寧年間的耆英會、真率會等)，已經相當地融入了洛陽當地有著相似志趣的士大夫圈子。

吳執中一家則是由曾祖吳遷起家，中間雖然沒有出過特別顯赫的人物，都是中低階文官，但到了第四代的吳執中都仍能考上科舉，維繫身為士大夫家族的地位。[184]吳家是在吳執中的父親吳祐之知洛陽縣時定居洛陽，湊巧的是，他們的住處剛好與程珦父子相鄰，吳執中也和二程交好，[185]由邵伯溫稱他「年德不在諸公(富弼、文彥博等)下」的敘述看來，[186]吳執中應當也是屬於學行甚高的人物，才能被拿來與富弼等人相比，並和程氏父子結為好友。在熙寧變法期間，吳執中也告老退居洛陽，同在洛陽的舊黨重臣如富弼、司馬光等人都對這位地方耆宿甚為禮敬，司馬光還「以兄事之」。[187]文彥博舉辦耆英會、真率會，廣邀洛陽年高德劭的士大夫參與，包括二程的父親程珦、富弼、韓琦還有劉幾、王尚恭和王慎言等人均曾與會，邵伯溫在《聞見錄》中關於此會的記載特別提及，吳執中雖未參與這些名士大夫的集會，但並非主事者有意遺漏，而是他「居洛多杜門，人不識其面，獨與康節相善」，因此未曾與會。[188]由這個記載，恰可從側面說明，吳執中在洛陽的士大夫圈子當中是相當被重視的一員。

在這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富弼和侯紹曾兩個家族的關係。富弼在至和二年(1055)初次執政時便曾邀請邵雍出任官職，之後又在嘉祐四年(1059)、嘉祐六年(1061)再次舉薦，邵伯溫也有「康節先公與富文忠公(富弼)早相知」的記載。[189]一般談到富弼與邵雍的關係，多半多由宗顥這名僧人

告。

183 劉馨珺，〈北宋洛陽耆英會：從碑銘談士大夫的交往活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臺北，2008)，頁6-7。

184 李寶宗、李晶晶，〈一則有關程顥、程頤、富弼、司馬光的北宋墓誌〉，頁98-100。

185 李寶宗、李晶晶，〈一則有關程顥、程頤、富弼、司馬光的北宋墓誌〉，頁98-100。

186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0，頁105。

187 李寶宗、李晶晶，〈一則有關程顥、程頤、富弼、司馬光的北宋墓誌〉，頁98-100。

188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0，頁105。

189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8，頁197。

說起，宗顥是洛陽天宮寺的僧人，富弼雖祖居洛陽，在天聖八年(1030)二十七歲以制舉入仕之前，就是寄居在宗顥修行的天宮寺讀書，準備考試，並受到宗顥的鼓勵。湊巧的是，邵雍在剛搬到洛陽時，也選擇了天宮寺作為暫時棲身之處，宗顥也同樣看出了邵雍不是一般人物，對他青眼有加。[190]因此一般多推論，是宗顥將邵雍引薦給了富弼，是邵雍得遇伯樂的貴人。[191]這個推測顯然相當合理，但或許並不是唯一的解釋。

富氏一族從富弼的曾祖富處謙起家，富弼的祖父富令荀也有官職，父親富言是咸平三年進士，[192]富弼本人則在天聖八年(1030)得第，[193]並甚得范仲淹(989-1052)、晏殊(991-1055)的看重。富家自富處謙遷居洛陽後，便定居於此，[194]到富弼時已經是第四代。根據近日發掘出的富氏家族墓誌記載，富弼的弟弟富鼎娶侯氏女子為妻，在這名侯夫人的墓誌記載中，她的父親侯紹雍與侯紹曾同是宋初大臣侯益的曾孫，因此這名侯夫人應是侯紹曾的族姪。[195]而在選擇下一代的婚姻時，富鼎的兒子富紹寧也同樣娶了侯氏女子為妻，雖然在現有的史料中並未記載富紹寧妻子的家世，但依宋人喜好世代互為婚姻的習俗來看，富紹寧的妻子很有可能同樣是出自侯益家族的女子。[196]宋人的家族觀並不僅限於父子祖孫三代之間，儘管宋代只規定了祖父母在需同居共財，但是他們的觀念可能更接近於有著共同的家族意識，而在「聚居型」和「共祖屬型」家族之間過渡，對於族人的組織規範、互助合作或家族意識都有各自深淺不同的區別。[197]侯紹曾對這位族姪的婚

---

190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9，頁211。

191 如鄭定國，《邵雍及其詩學研究》，頁148；張明華，〈富弼與邵雍關系之研究〉，頁42-47。

192 龔延明、祖慧，《宋代登科總錄》第1冊，頁203。

193 傅璇琮，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一)》，頁147。

194 洛陽第二文物工作隊，《富弼家族墓地》(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富鼎墓誌〉，頁56。

195 富紹榮，〈宋故比部員外郎累贈中散大夫富君夫人長壽縣太君侯氏墓誌銘並序〉，收入洛陽第二文物工作隊編，《富弼家族墓地》，頁57。侯氏出於宋初大臣侯益之後。

196 富紹榮，〈富紹寧墓誌〉，收入洛陽第二文物工作隊編，《富弼家族墓地》，頁61。

197 柳立言，〈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期第2卷(臺北，2010)，頁297-300。

姻，以及對方家族是否熟識，如今在沒有更進一步史料的情形下已不得而知。但是侯、富兩家都是久居洛陽的士大夫家族，兩家彼此聯姻，再加上富弼和尹洙、梅堯臣等曾同在洛陽錢惟演幕下，侯紹曾又與尹、梅兩人交好，此一淵源很可能是如邵伯溫所說，富弼與邵雍在遷居洛陽之初很早就互相認識的原因。

這些志趣相似的家族和成員之間的關係並不單集中於尹洙，譬如劉燁就和王益柔之父王曙是朋友，曾向宋真宗當面稱許過王曙治蜀的功績，[198]又曾在王曙因岳父寇準被貶之際挺身而出。[199]劉幾的墓誌則是由同時身兼王益柔妹夫、侯紹曾好友，以及儒學同道的陳安石所作。[200]他們都是在洛陽居住至少兩代以上的士大夫家族，且彼此都有近似的學術傾向，又互有聯繫，也隱隱然形成一個概括了血緣與學緣的人際網絡。

四、結論

據筆者初步研究，在邵雍遷洛前期，與他交好的這批人多半出自於歷代為官或業儒，愛好古文且久居洛陽的士人家族。平田茂樹曾將宋代士人的社會關係分為：血緣、業緣、地緣和學緣四個分類。邵雍在血緣上並無特殊之處，只是一般的白衣士人，前代既無功名，親族之間也沒有特別突出的人物。拜李之才為師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除了使他在學術上更加精進之外，李之才這一系的師門人脈也在他數度科舉失利、嚮往洛陽，希望能融入士大夫交游圈的初期助他甚多。就如一滴墨水滴在紙上，墨色必然沿著紙張的纖維、紋路流動。名重一時的富弼、王拱辰等宋代名臣相繼舉薦邵雍出任官職，並不單純是茫茫人海中慧眼識珠的傳奇故事，邵雍的聲名和人際關係也是由他在洛陽最初的關係網絡開始，順著地緣、血緣和學緣彼此交織的脈絡一層層擴散開來。儘管尹洙早在慶曆八年(1047)就已經過世，侯紹曾為官後也離開洛陽，但他們在當地仍留有豐富的人脈。

---

198 脫脫，《宋史》，卷262，〈劉燁傳〉，頁9074。

199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3，〈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公墓表〉，頁51-53。

200 張應橋，〈北宋劉幾墓誌考釋〉，《四川文物》，第3期(成都，2011.03)，頁67。

如尹洙的得意門生兼女婿張景憲、受尹洙賞識的王益柔、尹洙好友劉幾，以及曾參與錢惟演幕下盛會的王尚恭、富弼等人。在到了洛陽之後，邵雍先是藉由李之才和尹氏兄弟，還有他自己學生侯紹曾(也是尹洙好友)的「學緣」關係打入了當地士大夫的交游圈，並且憑著自身的學識修養，開始在洛陽士大夫圈子中嶄露頭角。

與邵雍來往的這一批人大抵擁有近似的學術傾向，愛好以義理為宗、經世致用的古文，並藉由閱讀經典，理解聖人記載於經典中的微言大義。也因此他剛到洛陽時往來最密切的，幾乎都是和尹洙有著深厚情誼的士大夫，同時也是古文運動的支持者，甚至如劉幾一家，更是由祖父劉溫叟起，到劉燁、劉幾，一家三代都是古文的愛好者。儘管這群人的投入程度有輕重之別，從愛好儒學、古文者如張景憲、王尚恭，到欲由古文尋求古道、義理者如富弼、劉幾，還有最終以道學家面貌出現在歷史上的李籲、劉絢等人，這群人的學術傾向，其實都指向了一個宋代學術的重要轉向，也就是要重新回到經典中尋求義理，進而向內探求義理教化之源的共同呼聲。

再者，這一群人多半都是以家族為單位往來，都不是單獨個人的行為，雖說以尹洙為線索，但也是因為他的名聲最大、史料記載最豐富，因此可以作為一根引線的針，將所有線索串連起來，在史料未及之處，他們應當有更加頻繁的往來。

由上文的整理可以看到，尹洙在洛陽所留下的關係網絡，有很大的一部份是以家族為中心所展開，婚姻關係是擴展人際網絡的重要起點，如尹洙的和他的得意門生張景憲同時也是翁婿，在師生關係上又加上了一層婚姻關係，使彼此的連結更為穩固。而和尹洙熟識的這些家族之間彼此也常相往來，相互嫁娶，譬如劉燁就和王益柔之父王曙為友，劉幾的墓誌則是由王益柔的妹夫以及侯紹曾的好友，也是儒學的同道陳安石所作，王慎言則是娶了張師錫的女兒。這些家族的組成有相當類似的地方，幾乎都是歷代為官的士人家族，這樣的家族中可能在好幾代或者不久之前出過一個顯赫人物，但當這人過世後，並不代表這個家族就此衰微，子孫可能繼續擔任中下階層官僚，例如侯紹曾的曾祖侯益過世雖久，但他的子孫族人仍在洛陽開枝散葉，並和當地的士人家族互為婚姻，他們的血緣、學緣和業緣

關係以及學術傾向也就藉此保存在家族之中。例如在本文中所提到的侯詠、王益柔、劉燁等人，即使在今日他們的學術成就並不為人所知，也足以成為一個個連結的紐帶，作為牽引邵雍至洛陽發光發熱的連結。同時，即使如侯詠、侯紹曾等不得不因任官而離開家鄉，但他們舊日的血緣和學緣也使得他們的學術積累得以保持，不致分散。在邵雍遷居洛陽的此一過程中，可以一窺當時士人之間的學術網絡是如何組建，志趣相投的士人彼此又可能是如何流動、結交。邵雍此來，與其說是愛其人文風土，倒不如說是前來尋求可與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同道中人，並更深入地融入這個關係網絡。

附表1：熙寧以前邵雍洛陽交游表

出處	交游可考始點	姓名	屬於尹洙交游圈
聞見錄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張師錫	v
聞見錄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張師雄	v
聞見錄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張景伯	v
聞見錄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張景憲	v
聞見錄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張景觀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王益柔	v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王慎言	v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王慎術	v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王慎行	v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吳執中	v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劉幾	v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劉忱	v
贈詩、聞見錄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呂誨	
贈詩、聞見錄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劉元瑜	
贈詩、聞見錄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劉絢	v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李育	v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李籲	v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張諤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王起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王仲儒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姚奭	
聞見錄、贈詩	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	李寔	
聞見錄、贈詩	致和二年	富弼	v
聞見錄	致和二年	田棐	僅記載一次往來
聞見錄、贈詩	致和二年	韓絳	

聞見錄	致和二年	姜愚	
聞見錄	致和二年	張仲賓	
聞見錄	致和二年	王允修	僅記載一次往來
贈詩	嘉祐元年	王贄	僅記載一次往來
聞見錄、贈詩	嘉祐年間	程珦	v
聞見錄、贈詩	嘉祐年間	程顥	v
聞見錄、贈詩	嘉祐年間	程頤	v
聞見錄	嘉祐三年到五年間	文彥博	
聞見錄	嘉祐四年	黃景	僅記載一次往來
贈詩	嘉祐六年	章惇	僅記載一次往來
贈詩、易學辨惑	嘉祐六年	宋孝孫	僅記載一次往來
贈詩、聞見錄	嘉祐七年	王拱辰	
贈詩、聞見錄	嘉祐七年	周長孺	
贈詩	嘉祐八年	陳侗	僅記載一次往來
贈詩、聞見錄	嘉祐以後	王尚恭	v

資料來源說明：

1、交游可考始點註明為「邵伯溫記載遷洛初期」者，為邵伯溫在《邵氏聞見錄》記載邵雍初至洛陽時最常往來人士。富弼和王拱辰亦包括在其中。

2、出處為「贈詩」者，出自《邵雍集》中，邵雍在嘉祐八年以前贈詩有姓名可考者，頁181-242。

3、出處為《聞見錄》者，出自《邵氏聞見錄》中，在嘉祐八年以前與邵雍往來有姓名可考者。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史料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
文彥博，《潞公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王梓材、馮雲濠編撰，《宋元學案補遺》，北京：中華書局，2012。
石介，《徂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阮藩濟等修、宋立梧等纂，《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公司，1986。
邵伯溫，《易學辨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邵雍，《邵雍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胡寅，《斐然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成都：四川大學，2002。
范純仁，《范忠宣公文集》，成都：四川大學，2004。
晁說之，《嵩山文集》，《四部叢刊續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84。
祖無擇，《龍學文集》，祖無擇，《龍學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梅堯臣，《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曾棗莊、劉琳等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2。
劉占卿主編，《宜陽縣志》，哈佛燕京圖書館影印，光緒辛巳(1881)。
劉攽，《彭城集》，合肥：黃山書舍，2008。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
蘇軾，《蘇軾全集校注》，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龔延明、祖慧，《宋代登科總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二)、近人論著

中尾健一郎，《古都洛陽と唐宋文人》，東京：汲古書院，2012。
王水照，《王水照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王曾瑜，《錙銖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
平田茂樹，《宋代政治結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何新所，〈試論西京洛陽的交游方式與交游空間——以邵雍為中心〉，《河南社會科學》，第4期(鄭州，2011.04)，頁64-67。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11。
李之亮，《北宋京師及東西路大郡郡守考》，成都：巴蜀書舍，2001。
李寶宗、李晶晶，〈一則有關程顥、程頤、富弼、司馬光的北宋墓誌〉，《中原文物》，第4期(鄭州，2004.09)，頁98-100。
周君芸，《邵雍弟子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邵明華，〈話題與傳播：邵雍交游圈的深度考察〉，《西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蘭州，2012.05)，頁100-107。
邵明華，《邵雍交游研究——關於北宋士人交游的個案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
金中樞，〈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再續(上)〉，《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11期(臺南，1984)，頁1-18。
金中樞，〈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再續(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11期(臺南，1984)，頁19-37。
姚名達，《程伊川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柳立言，〈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期第2卷(臺北，2010)，頁289-364。
洛陽第二文物工作隊，《富弼家族墓地》，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祈琛雲，〈宋人的同年關係及其對同年關係的認同〉，《西南大學學報》，第1期(重慶，2012.01)，頁95-105。
唐明邦，《邵雍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張明華，〈富弼與邵雍關系之研究〉，《洛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洛陽，2012.03)，頁42-47。
張祥雲，《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
張應橋，〈北宋劉幾墓誌考釋〉，《四川文物》，第3期(成都，2011.03)，頁67-73。
扈曉霞、鄭衛、趙振華，〈北宋官員文士祖無擇生平仕履疏證(上)：以《祖無擇墓誌》和妻《黃氏墓誌》為中心〉，《洛陽考古》，第4期(洛陽，2016.04)，頁81-93。
梁建國，《朝堂之外：北宋東京士人交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郭鵬，〈邵雍遷洛之前求學與漫遊的再研究〉，《中國文化研究》，年冬之卷(北京，2009.04)，頁61-68。
傅璇琮，龔延明、祖慧，《宋登科記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森博行，〈司馬光・邵雍交游録(前)(中)(下の上)(下の下)〉，《大谷女子大国文》(大阪，2003-2006)，33-36號，2003-2006，頁34-52、1-21、1-22、26-44。
馮志宏，《北宋古文運動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2006。
齊運通，《洛陽新獲七朝墓誌》，北京：中華書局，2012。
劉連香，〈北宋邵雍書篆祖士衡墓誌考〉，《四川文物》，第1期(成都，2008.01)，頁71-77。
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劉馨珺，〈北宋洛陽耆英會：從碑銘談士大夫的交往活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臺北，2008,12)，頁1-42。
鄭定國，《邵雍及其詩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五)》，臺北：東大出版社，1983。
蘇舜欽著，傅平驤、胡問濤編，《蘇舜欽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舍，1991。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in the Early Stage of Shao Yong's Moving to Luoyang：Starting with Yin Zhu

Ji, Yan-ru
Ph. D.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henzo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story of Shao Yong's (1011-1077) association with many famous scholar-officials in Luoyang is a well-known story. According to my preliminary study, Shao Yong was introduced to Luoyang local scholar-bureaucrat circles as a partner of Classical Prose (Guwen) Movement and Confucianism. This Luoyang local scholar-bureaucrat relation network focused especially on Mu Xiu (979-1032), Yin Zhu (1001-1047), and Li Zhicai (980-1045). With his own knowledge and cultivation, Shao Yong quickly became an active member of Luoyang scholar-bureaucrat circles. Therefore, when Sima Guang (1019-1086), Wen Yanbo (1006-1097), and other famous scholar-officials retreated in Luoyang during the *Xining years*, Shao Yong, already a famous scholar at that time, quickly joined their social circle and became close friends with them.

Shao Yong's early friends in Luoyang generally had similar academic tendencies. Most of them have a scholar-offical or professional Confucian famiy background. They shared the love for Classical Prose (Guwen) and settled in Luoyang for generations. By examining the

process of Shao Yong's moving to Luoyang and focusing on Yin Zhu as a clue, this paper wishes to gain a glimpse of how intellectual networks were formed and how like-minded scholars might have become acquainted with each other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Shao Yong, Social networks, Yin Zhu, Luoyang, Confucianism, Classical Prose (Guwen) Movement, Song Dynasty, Epitaphs